

回归本土 留住乡愁——中国工程院崔恺院士专访

黄桥旧时光

藏书老镇区项目设计札记

快速乡村城镇化背景下的古村保护与发展——以南京传统石匠古村窦村为例

更新理念 重构体系 优化方法——对当前我国乡村规划实践的反思和展望

记忆的濒危

乡村规划建设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主编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所 副主编
江苏省乡村规划建设研究会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乡村规划建设

(第4辑)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所
江苏省乡村规划建设研究会

主 编

副主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规划建设. 第 4 辑 /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主编.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 - 7 - 100 - 11161 - 4

I . ①乡… II . ①江… III . ①乡村规划—江苏省—
丛刊 IV . ①TU982.295.3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957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乡村规划建设(第 4 辑)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主 编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所 副主编

江苏省乡村规划建设研究会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1161 - 4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名家视角

- 1 回归本土 留住乡愁——中国工程院崔恺院士专访 本辑记者 徐红云 富伟

文人心中的乡愁

- 6 黄桥旧时光 黄蓓佳
10 闲话乡愁 薛冰
15 把乡愁酿成香稠的村酒 邓海南

乡村建筑与规划设计

- 18 藏书老镇区项目设计札记 王建国 葛明 薛力等
26 驿路要冲，圣裔名村——南京市漆桥村历史文化价值研究 李新建 姚迪 海啸
38 礼社古村落养老旅游开发——历史空间的当代创新应用 吴立东 谢圣玥 史旭平
47 原乡·新生——以无锡阳山镇为例探索美丽乡村建设思路 崔晨勇

感悟与探索

- 59 快速乡村城镇化背景下的古村保护与发展——以南京传统石匠古村窦村为例 阳建强 王昭昭
67 更新理念 重构体系 优化方法——对当前我国乡村规划实践的反思和展望 梅耀林 许珊珊 杨浩
87 政府统筹、村民主导的新农村改造规划——以北京市海淀区某试点村项目为例 李文捷 柴朋成
96 江苏文化遗产解读的探索与思考 宋炯 盛志伟

人文随笔

- 102 记忆的濒危 薛翔
105 流淌着的外秦淮 盖星石

回归本土 留住乡愁

——中国工程院崔恺院士专访

本辑记者 徐红云 富伟

编者按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促使政府和学界以人文情怀重新审视和思考城乡空间。在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下，建筑设计如何回归本源、承载人们的乡愁、关注可持续发展，是当下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为此，本辑记者专门访问了中国工程院崔恺院士。

本辑记者：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与您2009年就提出的“本土设计”理念“不谋而合”。您认为“本土设计”应注重什么？

崔恺院士：我讲的“本土设计”实际上是立足本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而进行设计的方法，强调的是一种立足本土的理性主义。本土是指建筑所处的土地，这个土地既包含自然信息又包含人文信息。以土地为本的设计，就是本土设计。

中央提出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实际上具体地描述出了建筑与城乡景观、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关系。这个提法是对我国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忽视自然和人文环境、片面强调经济产值以及把建筑作为经济产业和商品而造成的城乡面貌缺失与建筑人文环境单调乏味、求怪求洋现象的一种理性反思和纠正。

我提出的本土设计，实际上是希望从建筑师的角度，促使更多的建筑设计能够从建筑所处的环境出发去认真思考，而不是为完成一个产值或个人的作品。本土设计的理念绝对



图1 崔恺院士

受访者简介

崔恺，1957年8月出生，毕业于天津大学，研究生学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工程设计大师，现任中国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曾获“梁思成建筑奖”、“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等多项荣誉。

不是提倡本地人设计的市场保护主义主张，而是研究建筑与地域环境的关系，也不同于过去继承传统和民族风格的讨论：继承传统一般理解是以传统为本去延续发展，而本土设计是以现实现地为本，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继承民族风格关注一个民族建筑共同的特色，而本土设计关注的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寻求具体的特色。另外，本土设计也不同于国际上地域主义建筑理论，地域主义是国际化主流之外的一种地域化的建筑，被当作一股支流，显然不适用于正处于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中心位置的中国。

这是我提这个理念的基本想法，关乎设计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设计策略。我希望将来能够将其发展成一个比较有普适性的建筑理论。虽然这种理论的基本论点在国际上已经存在，但是如何能够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再深化，这是我们需要继续做的事情。

本辑记者：您在今年银川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村镇规划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提出“善待乡土、珍惜乡音、记住乡愁”。您认为应如何去理解“乡土”、“乡音”、“乡愁”？

崔恺院士：作为国家设计院的建筑师，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中做设计，很少在乡村中做工作。参加银川会议让我了解到全国各地在村镇规划和建设方面的最新情况，收获颇丰。如何理解“乡土”、“乡音”、“乡愁”？我认为，“乡土”是指乡村的自然景观、田园景观和乡村风貌。对乡村田园物质环境的保护和发展要有规划、有保护、有更新。对于规划，不能用城市规划的方法，要注重学习传统乡村布局的特色，小规模，轻介入，渐进式规划；对于保护，也不能用文物保护的办法，而是一种传承的概念，在保护的前提下可以变化和发展；对于更新，乡村更新是不可避免的，但应有引导、有范例、有政策、有监督。“乡音”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来讲，就是方言、乡曲、手艺、地名和乡志、家谱，还有很多传说故事等。“乡愁”则是在每个人的情感、经历和记忆中留下的那些思念，其中既有乡土的物质空间也有乡音的非物质文化的记忆，这些东西都能寄托人们的情感，唤起乡情。

我特别喜欢习近平主席说的“记得住乡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乡愁的理解都不一样，甚至更多来自个人的情感和回忆，这样的乡愁是更广义的对人文情感的解释。建筑设计行业一直有民族形式、地域特色、地域风格的提法，但这种提法往往被简单地理解为就是把新的建筑和传统的形式做一些嫁接或者装饰，虽然结合旅游小镇的打造和传统村落的风貌保护也有一定的实际需要，但是对于与时俱进的大规模的城乡人居环境发展会产生制约和偏差。当今社会文化快速发展，建筑形式也势必要发展创新，如果说文化就把过去历史的特色找回来，那我们今天的建筑就不可能形成这个时代的特色，这显然不合逻辑。所以，用乡愁的方式来表达文化的传承实际上更宽泛，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对人的情感的唤醒，它可以依赖于村口的一棵大树、山上的一座古塔，也可以依赖于房前的一条小河沟、

村中留下的一条石板路，还可以依赖于方言、老地名、老宅祠堂里的陈设或是地方戏曲、菜肴、手工艺品等，所有这些物质和非物质的东西都可以变成寄托乡愁的地方。所以，保护乡愁、留住乡愁、记住乡愁不见得依赖仿古建筑，虽然它也会在建筑上有所反映，但是应该更多地从多元化、多方面去综合考虑记住乡愁的可能性。要避免把一些老村子全都变成开发商重建的空间，要把村子里那些具有乡愁意义的点点滴滴的情感要素及其载体真正保留下来，活化起来。

前段时间去台湾进行两岸的学术交流，我结合中国工程院村镇风貌课题研究走访了台湾的乡村。总体上可以说台湾的乡村建设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已经找到了一个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其做法给我们的启发很大。第一，经过土改，台湾乡村农民的土地和房产早已实现了私有化，使老百姓跟自己的地和房屋建立了一个直接的、可以传承的权属关系。通过这种传承关系，一代一代的人根据生活需求将其所住房屋进行改造、维护和修建，形成了地域的乡土风貌和建筑。第二，对于由于产权关系复杂而弃用的老房子，甚至已经破败的房子，可以通过转移租赁和政府补贴进行保护和修缮，有的变成茶馆、餐馆或民宿进行经营，也有的发动村民自助改造，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或社区文化设施。总的来说，台湾对农村风貌的管理是建立在对农民的产权、物权尊重的基础上去客观地引导，不会也不允许采用简单化的、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村庄的田园风光和形态格局是自然的，不是人为规划的。虽然风貌总体上并不那么漂亮，但也不会因一个决策的错误造成整体的破坏。当然，我也觉得公有制经济可以办大事，能够加快国家的发展，但是对于广大的农村来讲是不是需要这样一种快速的变化，还是让他们保持在一个自然生态的系统中去发展，逐渐地使乡村呈现出那种令人愉悦的、带有幸福感的、多样性的、真实的时代风貌。这种方式想要实现势必要很长时间，但乡村的慢生活、乡村演变的慢节奏却是当今社会越来越需要的东西，城里人到农村去生活也是希望体验有别于城市的慢生活。

本辑记者：您认为中国乡村发展和规划建设应当关注哪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师如何积极作为？

崔恺院士：乡村的发展实际上需要从乡村整体人居环境的改善入手，优先考虑解决乡村的卫生问题、产业发展问题、建筑安全问题。需要针对这些问题研制专门适合乡村的应对方法，如公共厕所和污水系统应该采用小而分散的系统去解决，而不是武断地用城里的高成本、高维护的方式来解决。认真维护和修缮乡村的重要历史建筑和乡土建筑，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也要传承传统的工艺，培养建设农村的专业施工队，让他们在乡村规划建设中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

我个人认为乡村规划建设应该是专业设计和非专业设计的一种巧妙结合，通过专业设计

解决好必要的建筑安全和公共设施配套问题，其他部分由农民自己根据经济财力进行搭建，在降低农民负担的同时保持农村的建筑多样性。应该取信于民，让老百姓自己乐于建设自己的家园，而不是单单由政府推动、村主任管理，这样建设家园才会是可持续的、有吸引力的。同时，在规划中也应尽量保持原有村落格局，严格控制村落发展边界，尽量在原有宅基地基础上改善和生活，让更多的田园能够得以保留，而不是到处圈地建设，造成大量土地的流失。

据了解，台湾的乡村复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社区营造，主要是复兴当地的社区文化，通过学者辅导、村民回忆的方式将家家户户的故事用文字记录在小木牌上，放置在村中的许多地方，让老百姓重新认识自己的地方文化和历史。第二阶段是乡村风貌改善，政府会请专业团队专项梳理乡村地域环境、气候特点和建筑文脉，然后制定相应的导则，以此为依据进行引导，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老百姓都会结合需求请建筑师参与一些改造。第三阶段是产业复兴，政府花很大力气复兴地方农业、传统手工业，同时注入新的产业。如通过传统酒文化的梳理、地方小产品的开发，将快要倒闭的酒厂办成了博物馆，复兴了当地的酒产业。还有通过艺术家下乡或者建筑师设计村落美术馆的办法，请搞艺术的学生、设计师在墙上画一点重现原来村子的老场景的壁画，收一些老物件做现代的装置艺术散落在村子里，带动村庄创意产业和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我觉得下一步建筑设计的主战场应该从城市向乡村发展，并在有特色的乡村找到自己创作的品牌。当然这个前提是不能以经济目的为主，否则必定会破坏乡村。建筑师应该以文化的态度去做这件事情。同时，我觉得中国现在最需要盖房子和最需要改善民生的地方也是乡村，每一次自然灾害受害最多的主要也是乡村，如何让村民有安全感，房屋安全质量是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当下设计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在乡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建筑师要想发挥作用，就需要跟社会学家、乡村工作者、老百姓密切配合，不仅从建筑本身思考问题，也要真正从挖掘乡村的故事和文化、保持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复兴地方产业等多角度去综合考虑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有一种协调机制，把设计界、研究界和教育界的学者联合起来一起做乡村规划建设。其实，我们现在做乡村调研也不是单打独干的，团队中有做建筑的也有做规划的，还有做乡村产业研究、人类学研究和生态环保方面研究的学者。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比以往单打一地刻意营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做法会好很多，下一步的城乡发展也应该有这样的新理念和新路径。当然我们也希望能提出一些新的设计机制和设计管理上的好建议。

本辑记者：您认为从政府层面应如何引导中国的乡村发展？

崔恺院士：首先政府应该要反思和总结以往乡村规划建设中一些失败的教训，要学会不做什么。不要一味追求做大、做快。其次，应该做好农村的产权确权工作，这事做起来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早晚还是要做，这是赢得民心的大事，是真正对老百姓、对农民的尊重。在做好这件事的基础上再去寻找乡村建设自下而上的生长机制，在这方面台湾农会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台湾的农会是一个基层自治组织，其主要目的是协助农民解决问题与满足要求，涉及金融贷款、农业保险、农民福利等。在农会里大家协同合作，互相帮助，避免造成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再次，要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风气。我们常常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挂在嘴边，很少把它当成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来落实，真正渗入到老百姓的心里。中国的文化态度应该是得体的，对自然和人文环境出于一种善意的表达，做出善意的决策，出于善意地为乡村做好服务，扎扎实实干事情，为百姓谋福利。最后，政府部门应考虑如何用一些新的操作方法让设计者下乡，尽量降低设计成本。减少无谓的招投标制度的管理，减少审查制度上的官僚体制，可以考虑用乡村责任建筑师的办法让那些有文化责任感的建筑师对一个乡村持续地负起责任，使乡村既成为建筑师创作的平台，最终也达到建设美丽乡村的目标。

黄桥旧时光

黄蓓佳

1969年，“文革”的尘埃还未落定时，任职于县教育局的我的父亲被勒令带着全家下放，落脚点是黄桥古镇。从初一年级到高中毕业，在那个破旧、安详、烟水氤氲又热气腾腾的苏中小镇上，我从懵懂少女到知识青年，度过了最难忘的青春时光。

因为父母都在黄桥中学任教，自然而然地，那几年中，我们住在黄中的教工宿舍。进院门一个黄泥小院，面对面两排砖瓦平房，房间里本来也是黄泥夯地，雨天潮湿得能长出蘑菇，父亲带着我们燕子衔泥一样，从外面拣来一筐筐的碎砖，拼拼凑凑铺成了砖地。外屋放煤炉，锅盆碗筷一应杂物，挤挤挨挨两张木板床，安顿我们姐弟三个。里屋是父母的大床，加一架衣柜，几个箱笼，一张父母亲备课批卷子的办公桌，还有一张吃饭的矮桌。夜里煤炉封了火，煤气在小屋里袅袅发散，一家人却日日安然无恙，可见门窗漏风的程度。

我清楚记得我们学校的样子：很大的校园，一半以上的面积被菜地和树林占领。菜是油菜和蚕豆，树是梧桐和水杉。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满校园金黄，蜜蜂会嗡嗡地飞进我们的教室，引出女孩子声声尖叫。五月蚕豆花开，紫色的小花甜津津的，大概学校里每一个学生都尝过那些花朵的滋味。校园里余下的面积，四分之一盖满了教室，四分之一是教师和学生的宿舍。灰砖灰瓦的平房一排挨着一排连绵起伏，很是壮观。校园的周遭是河，有水泥桥和木桥分别连通学校的前门后门。冬天河水平浅，冰面居然也会冻得结实，调皮的小孩子上学就不从桥上走，直接从冰面上滑过去，很刺激。夏天水大了，偷着下水戏耍的学生很多，学校三令五申不准下河，没用。后来淹死一个人，大家才有了怕惧，不是怕河水，是怕死鬼在水下面拽人。

黄桥中学向来是苏中地区伸一只手数得过来的好学校，不仅仅校园广阔，校舍整齐，还因为从1950年代反右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群众运动，把上至省城名校毕业生，下至县中的教学骨干，陆陆续续遣送到黄中当了老师，迫令他们思想改造的同时，也起用了他们丰富的学养知识。一个人有了知识和没有知识是真的不一样啊！那些小镇中学的老师们，他们布衣布鞋，面庞清癯、白发飘飘，双肩微耸，夹着厚厚的备课笔记和作业本从校园中疾步而过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文明和理想是怎样从他们的身体中穿透而出，像

作者简介

黄蓓佳，著名作家。

一股气息和一道清风飘荡在学校的空气中，使这里的每一块砖瓦和每一棵树木都变得端庄和厚重，使坐满了教室的汗气蒸腾的农村孩子们静默和思考，而后一点一滴地、潜移默化地在精神的世界里向他们靠拢。

四年黄中生涯，我以一个全优生的资格毕业，插队又四年之后考上北京大学，不能不说，跟我的那些兢兢业业教书育人的中学老师们有关，跟我就读的那个弥漫着油菜花香和油墨芳香的美丽校园有关。

出学校门，过小桥，便是当年纵贯古镇的一条大道。现在想起来，说是“大道”委实汗颜，因为碎砖铺成的路面弯弯扭扭宽窄不等。宽处恐怕两丈有余，走卡车，走拖拉机，走各种板车、独轮车、自行车，还走着成群结队挑担子上街的郊乡农民。窄处至多两米，两边是挨挨挤挤的开水炉、烧饼铺、竹器店、裁缝摊，卖大头菜和萝卜条的酱园子，卖金针、木耳、红枣、莲子和茉莉花茶的南北货店，卖桃酥、脆饼和金刚脐的茶食店。酱园子的气味最难闻，黄豆、蚕豆之类煮熟腌晒再晾在太阳下发酵，绿头大苍蝇绕着酱缸嘤嘤嗡嗡，那种味道至今想起来都要皱眉。茶食店在我们的心目中最可爱，混合着猪油、芝麻和蜜糖的烘焙焦香飘荡在街上，闻起来多么令人陶醉！只可惜，在黄桥生活的那几年，我去得最多的是酱园子，一毛钱打一瓶酱油，或者两分钱买一包下粥的萝卜干，而可爱诱人的茶食店，印象中总共去过不到三次。可见那个时候，茶食点心是我们生活中的稀缺物品，比如今的燕窝、海参还要珍贵许多。

从我们学校顺着这条宽宽窄窄、弯弯扭扭的大道往南走，印象中要走过一个百货商店和一个正经八百能办酒席的饭店，而后到丁字路口。对这两家黄桥镇上“高大上”的场所我印象不深，是因为当年总是从门口一径而过，而少有进门消费的机会。去百货商店买东西是我母亲的事，扯几尺布啦，买个被面、鞋面啦，这种购物的快乐要由她独享，小孩子们无从染指。大饭店，更是与我无缘，据说店里的红烧肉是黄桥镇一绝，因为这一带的人会养猪，猪肉品质向来独霸一方，可是那个时候的中学生，哪有机会跑进饭店去品尝佳肴！倒是每年初春，饭店里会搬出一只硕大的炭火炉在门外，当街制作黄桥名点“草炉饼”，我奉父命去买过一次。那种“草炉饼”，其实就是现如今遍街出售的“黄桥烧饼”，小孩子巴掌心大小，猪油酥擦馅，密密地撒一层芝麻，刚烘出炉时，趁热咬一口，滚烫的猪油从开口处溢出来，顺着嘴角、手指缝一路流下去，稍不注意就污脏了衣襟。那种浓厚肥腻的油酥香味，用一句黄桥话说，叫作“打嘴不丢”。有两块草炉饼下肚，真就有了“脑满肠肥”的舒服，仿佛整个人，整副饥饿的肚肠，一瞬间变得滋润和舒展，如花朵绽放一样，流光溢彩。

丁字路口的这一横，往东去汽车站。年年寒暑假我都得回老家如皋探望外婆，汽车站是我去得比较多的一处场所。我还记得17岁那年，在黄桥车站，一个矮小的乡村老太太站在我面前，仰脸望我，说了一句：“好俊俏的姑娘！”这句话在我心里引起的喜悦和震动，

不啻如今说一句“你是女王”，因为我长到那么大，从来没有人说过我长得好看。也因此，相隔40年，黄桥汽车站的模样，我闭上眼睛就能够画得出图样。丁字路往西走下去，过了护城河高高的桥，再有几里路，是黄桥一个有名的乐器厂，当年就以出产小提琴闻名，现在已经成了镇上的支柱性产业，生产很具规模，提琴之外，各类乐器应有尽有，慕名而去采购心爱之物的艺术家们成千上万。守着这样一个乐器厂，年少时竟没有学得一弦一琴，想起来也是我的遗憾。

从镇上的大道往两边延伸，仿佛蜈蚣肚皮下长出的百脚，一条又一条狭窄的小巷，以更为浓重的人间烟火气，更加活色生香的家常小景，构成了黄桥古镇的生息轮常。小巷里没有秘密，一家炒菜，家家闻到油香；巷子两边的人家，脚一伸，这家的台阶直接就能跨进对面那家的门槛。卖针头线脑的，纺纱织老土布的，打烧饼的，弹棉花的，修雨伞钉鞋掌的，多集中在这样的巷子里。当地的风俗，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打糕做馒头，馒头大致分咸菜馅的、萝卜丝馅的和豆沙馅的三种。主家自己备馅，拿脸盆盛着，一盆盆端到小巷里的馒头店，由店里出面粉、老酵、蒸笼炉灶，加工完成之后，主家再去人一篮又一篮地挑回家去。整个正月里，这是黄桥人家过年待客的上好主食。每年到腊月底，我父亲就动手做馅，我是他的得力手下，煮红豆洗沙、刨萝卜丝、洗咸菜切咸菜，都是我的事。到了做馒头的那一天，我和父母通宵守在小巷的馒头店里，心惊胆战地等候第一笼馒头出锅。如果面发得好，馒头雪白饱满，预示着下一年和和顺顺，大家就都眉开眼笑，父亲忙着给伙计们散烟，感谢他们尽心劳作。也有的年头，因为种种原因，发面的伙计会失手，馒头出锅时坑坑凹凹，白一块黄一块，全家便心事重重，惶惶不安，生怕来年有什么厄运降临在家人头上。

灶膛里熊熊的火光，蒸汽氤氲中的面香，从馅料中渗透到面皮里的黄澄澄的油迹，吹着手指头迅速从蒸笼里拣拾馒头的欣喜，掰开一个馒头边吃边滚动舌头的贪婪，那些古老又美好的让人掉泪的时光，于我，于我的兄弟姐妹，于我的朋友和同学们，都已经久违了。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我仍旧住在少年时代的那种简易平房中，乡村教室那样的平房，长长的一排，有带檐的走廊，墙和地面的色调灰暗沉闷，无风无雨，却莫名地有一种阴冷的瑟缩。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要我把她的存折找出来送给她。在那个梦境中，我的存折，我母亲的存折，我所有的毕业证、结婚证、房产证、身份证件，都被我谨慎地藏在平房走廊下的麦地里，在那些茂密生长的油菜和麦苗下面，和庄稼的根须缠连在一起，成为土地的一个内容。我拿铁锹挖，怎么都挖不着，所有我的珍贵物品都不见了踪影，它们像渗入泥土的空气，像麦地追施的肥料，像土壤中的化学元素，就那么在我的脚下倏忽而去。

我知道，是我把我的宝物弄丢了。

我把宝物丢失在故乡，在我少年生活过的地方，在古镇黄桥。

是的，我应该回去一次，看看那些宽宽窄窄的街巷，那座书香弥漫的校园，那些快乐、勤劳、灵巧的鞋匠、篾匠、铁匠、锡匠，那些烧开水炉的、贴烧饼的、弹棉花的、推车挑担子的，那都是我的乡亲，是坐在街边上一天一天看着我成长的人。

只是，我害怕他们都不在了。温暖的旧日时光不过是一帧墙上的照片，有色彩，无气味，能够看见，却不能触摸。唯愿故乡长存，古镇长存，踩上新时代的节奏，留下老日子的醇厚。

闲话乡愁

薛 冰

乡愁，通常的诠释，是眷念家乡的情感状态。古代的哲人说，人生是从来处来，到去处去。故乡，就是人们的来处；乡愁，便是人们对来处的思念与探索。

人是一种需要精神寄托的动物，而最能得到公众认同的精神寄托，大约就是家乡故园，英雄豪杰的解甲归田，达官显贵的衣锦还乡，文人雅士的归田园居，富翁贫汉的叶落归根，无不源出于此。“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晋常璩《华阳国志》），生动地描绘出成功人士对家乡的高度重视。

乡愁，又是一种微妙的情感，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背井离乡，家乡始终在游子的魂牵梦绕中，随时随地都可能被触发。或思亲人好友，“念我舍乡俗，亲好久乖违”（南朝宋鲍照《代郎街行》），“白发还乡井，微官有子孙”（唐崔峒《酬李补阙雨中寄赠》）；或见山水景观，“驱马傍江行，乡愁步步生”（唐杜荀鹤《江岸秋思》），“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唐王维《杂诗三首·其二》）；或闻乡音乡语，“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唐贺知章《回乡偶书》），“亦欲举乡风，独唱无人和”（宋苏轼《馈岁》），“一曲乡歌齐抚掌”（前蜀李珣《南乡子》）；或尝家乡饮食，“客来一笑同乡味，便粉秋菰刷藕泥”（宋陈造《对客再次韵》），“乡馔雨余收白蕈，客樽秋后对红英”（宋曾巩《送英州苏秘丞》）；诚可谓“寓目皆乡思”（南朝梁何逊《渡连圻》），“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宋李清照《一剪梅》）。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唐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逢年过节，更是游子思乡情切之时，“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唐刘长卿《新年作》）。白日里世事烦扰，待到夜深人静，独自孤处，乡愁渐生，“千里作远客，五更思故乡”（清沈受宏《客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唐李白《静夜思》），“万里归心对月明”（唐卢纶《晚次鄂州》），“愁中入梦是乡园”（清陈梦雷《癸亥春日即事》）。只能借梦中家园聊慰思乡之情，“容颜岁岁愁边改，乡国时时梦里还”（唐杜俚《客中作》）。“家书端可驱邪祟，乡梦真堪疗客饥”（元侯正卿《菩萨蛮》）。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宋李清照《菩萨蛮》），然而人生毕竟沉醉时少，清醒时多，“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唐崔颢《黄鹤楼》），“十年不对乡间竹，垞北

作者简介

薛冰，著名作家。

“培南思杀人”（清朱彝尊《题张上舍劭竹林独坐图》），“乡念一邅回，白发生俄顷”（南朝梁何逊《望廨前水竹答崔录事》）。最令人伤怀的是余光中的《乡愁》：“后来啊，乡愁是一方小小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好像已经进入了一个乡愁日淡的社会。一方面，人口流动性加剧，移居他乡成为常态，感情上的承受度也相应增强，“初来犹自念乡邑，岁久此地还成家”（唐韩愈《桃源图》）；另一方面，家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日新月异，面目全非，人们的乡愁渐已无所寄托。如果说前者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后者则是文化断裂的标志。

故乡为人所眷念的缘由，虽言人人殊，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首先是人文环境，聚族而居的亲缘血脉，难以割舍；自幼及长所受的爱抚呵护，记忆深刻；人生最初的启蒙教化，影响到世界观的形成；习以为常的乡风民俗，养成行为规范。其次是空间环境，这在乡村中尤其明显。村庄处于广袤的田野间，邻近必有河塘，房前屋后广植树木，鸟唱蝉鸣，蔬菜瓜果随手可得，春种夏忙，秋收冬藏，行止顺天而为，与大自然和谐交融。在城市里，传统建筑多傍水而建，四围绿树环绕，庭院种植花木，同样是追求与大自然的融合；而建筑体量与人相称，也给人以亲和感。

在这样的自然与人文氛围中生活惯了，一旦外出远游，遭际与其反差越大，乡愁自然越重。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中说：“贞观中，天下丰饶，士子皆乐乡土，不窥仕进。”这虽不能说是普遍现象，但晋人陶渊明一篇《桃花源记》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乐于“采菊东篱下”，素来为人所称颂，无疑反映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种价值观。重要的是，这不仅是一种文化理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现实。高官巨贾，文人学者，功成名就之后，转往乡村中修造园墅的，不乏其人。在皖南、苏南、浙江、江西等地，现在还能看到大量这样的旧址和遗迹。这些园墅并不一味照搬城市建筑的模式，往往更钟情于借助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

城市中的家族聚居，意识形态的瓦解，始于1949年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为避免受牵连，家族成员间逐渐拉开距离，甚至同居一院而陌如路人，“文化大革命”更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市居民下放，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居住状况；1970年代末知青与下放居民返城，原住地多已为人所占，不得不另觅居处。近20年来城市居民贫富差距加大，在面临老城区拆迁时各有选择；除了极少数豪富家庭，已不可能再现家族团聚的局面。

农村里的变化始于1990年代，进城打工的青壮年与日俱增，许多村庄渐成空巢，只剩下老人与孩子；而在城市里生活久了的人，已难以再回到农村中生活。近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中，不乏村庄盲目模仿城市建造大规模居住区，强迁农民“上楼”，成批地毁弃原

有村落的空间形态，严重地破坏了农村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环境。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乡愁是以故乡为依托的文化现象，对于市民和农民，原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1949年之前，城乡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农民可以进城从业，市民也可以下乡居住谋生。即对现在的城市居民成分进行分析，三代以上，多半来自农村。进入乡村的市民，为农村生活提供新鲜的样板，即如前述官绅文士在乡村中营造园墅，无形中成为一种示范，使农民有所向往和模仿。而进入城市从业的农民，回乡时又会带回大量新信息，这固然会在某些方面引起农民心理上的不平衡，如唐李绅《悯农》诗所描绘：“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但同时也会产生若干积极的因素，如提供商机，引导生产，激励一些人的奋发与追求。

然而，20世纪后半叶，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越来越大，其重要原因就是城乡居民交流渠道被阻断。1950年代初，因政府无法保证城市基本生活资料的供应，数次大规模向农村疏散人口，实施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城市与乡村间的人口流动完全停滞。以牺牲农村为代价保证城市发展的结果，是短短三四十年间，就使城乡之间天壤相隔，以致农民竟完全不了解城市生活的真相。

1968—1975年，我在苏北农村插队，隐约感觉农村文明仍停留在20年前。如知青每天用牙膏刷牙，会引起农民围观，让我想到1950年代初，市民中习惯刷牙者寥寥，用牙膏者更少。西红柿、四季豆等蔬菜品种，农民都没有见过。即使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知青带去的某些城市生活方式，也引起农村青年的仿效，改变着农村的生活习惯。我们从省农科院引进的山芋新品种，使当地山芋单产提高了两三倍。知青带农民进城治病，他们回去后对城市的描述，引起农村青年的强烈兴趣，许多人因此想方设法筹钱，生平第一次踏进城市。然而，正像知青难以返城一样，他们更没有进城生活的希望。

人文生态严重落后之外，1970年代中期，乡村自然生态又开始遭遇危机。以进口日本化肥为肇端，各县纷纷上马小化肥、小农药，环境污染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机肥料迅速被取代，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然循环系统被瓦解。无机肥料和有毒农药的滥用，导致大量农田劣化恶化，天上不见鸟，水中没有鱼；而被弃用的有机肥料、城市粪便和生活垃圾、农作物秸秆，又成为新的污染源。在急功近利政策的引导下，一种良性循环完全被恶性循环所取代，如今已是难以逆转。

近年来，我多次到苏北、苏南农村采访，对于很多村庄一度盲目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极为困惑。不是说农村面貌不要改变，村庄的形态和建筑其实一直在变化之中。我插队的八年，可以说是中国农村发展最低谷的阶段，有条件的农民仍在谋求居住条件的改善，在普遍的土墙草顶建筑形式中，尽可能采用较好的建筑材料，如以砖石砌墙或

墙基，以瓦顶替换草顶；并且善于接受新建材，如以钢筋水泥梁柱替代木构梁柱等。所以，建筑材料的现代化，居住功能的现代化，甚至建筑样式的变化，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村庄形态。

因为功能的不同以及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乡村建设理应研究乡村生态的特点与优点，从中发掘出提升的途径，而不是以城市为模板对乡村进行硬性改造，不是将乡村变成一种微缩城市。乡村应该保持与城市的互补状态。

最近几年，江苏各市县从整治乡村环境入手，做了大量工作，有效地提升了农民的居住与生活水准。但这仍不能算治本之道。

城市近郊的一些乡村，打造“慢城”，发展“农家乐”，固然能提高这些乡村和当地农民的收入，但这仍不能作为广大农村的发展方向。

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基础产业，农业是无可替代的。

所以，关键在于，如何让农村生活重新具有吸引力？

或许可以说是乡愁的召唤吧，也是在最近几年，一些城市中的实业家，陆续在转向农村，转向农业，成为新一代农民。在冷酷的钢筋水泥包围中困扰得愈久，对田园绿色生活的渴望反而愈强烈。据了解，仅在南京周边，类似的大小农场就已经发展到数十家，有的种粮食，有的种蔬菜，有的种瓜果，有的养禽畜，有的甚至模仿古人的晴耕雨读生活。而其共同点则是，他们都选择了现代污染尚未波及的土地，努力重建传统的农业生态循环，摒弃无机肥料和有毒农药，在为社会培育新一代健康食品的同时，为自己营造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曾经访问过其中的几个。

坐在简陋的房舍中，可以看到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色，春天的花，夏天的绿，秋天的果实，冬天的白雪（图1、图2）。



图1 临湖人家

资料来源：邹建平，著名作曲家，教授，博士生导师。